

在雍正皇帝的眼中，田文镜是“巡抚第一人”。雍正甚至提出，如果地方的封疆大吏，都像田文镜和鄂尔泰那样，则天下“允称大治矣”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田文镜是执行雍正一系列除积弊政策最彻底的人。但说起田文镜的仕途经历，堪称“出奇”。而最令人唏嘘的是，他得到雍正重用，是因揭发山西匿灾不报，而他最后失信于雍正和河南地方百姓的，竟然也是匿灾不报。

（一）

田文镜是汉军旗人，康熙元年出生，22岁正式走上仕途，经过40年为官，在康熙朝做的最高官位，还是一个从四品的中层官员。升迁的路，慢得“出奇”。

如果没有什么“意外”，到雍正即位时，年过花甲的田文镜，已经准备收拾行囊，告老还乡了。但他的仕途生涯却因一次再平常不过的差事而完全改变。

按照惯例，新君即位要告祭山陵。田文镜前往告祭的是西岳华山。正是这一次告祭，给他的仕途带来“四级跳”。因为他向雍正讲真话，揭露山西匿灾不报，而且还征比钱粮。

雍正元年，是启用雍正年号的第一年。北方出现了少有的旱灾。雍正对此非常关注。自康熙后期，清朝就有“雨雪粮价”的奏报制度，而对灾害的奏报制度要更早。山西巡抚德音接二连三奏报山西雨雪充足。他在正月奏报说，山西普降大雪一尺多厚，百姓都说：许多年没有见过这样的大雪，全省麦子必获丰收。

如果放在平时，地方官报喜不报忧，也习以为常。但这是雍正改元的第一年，更何况，这是人命关天的事。雍正从两个可信的渠道，验证德音匿灾不报，说了假话。第一个人是年羹尧。他于正月进京，沿途看到山西各处百姓流离失所，异常萧条的景象，经询问是因为闹灾荒的缘故。年羹尧当即向德音表示：你应该查明歉收州县，向皇上奏请缓征钱粮。在京期间，年羹尧也向雍正奏报了山西受灾的情况。四月十二日，年羹尧启程离京返回西安，一入山西境，灾荒的严重程度更加凄惨，天气干旱得出奇，麦苗稀少，即便有也非常短小，平阳府是大都市，但到处是沿街讨饭的人。年羹尧说，山西百姓非常节俭，这分明是受了严重灾荒所致。如



□ 林 乾

田文镜：从赈灾救民到匿灾误民

果到了四月底，再不下几场大雨，即便赈济，都怕来不及了。

第二个人就是田文镜。田文镜告祭华山回京，已是四月十四日的事情了。雍正向他询问沿途经过地方的情形。田文镜一直摇头，回奏说：山西平定州、寿阳县、徐沟县、祁县等处，雨泽歉少，民间生计维艰，汾州府属地方，得雨亦未沾足。而地方官现在仍然在征比钱粮。所谓征比钱粮，是采取强制手段，把没有缴纳钱粮的纳粮户，关押在衙门里，由吏胥逼迫缴足钱粮后才放人。此举最易引起民变。

雍正感到事态严重，立即召集总理事务王大臣，采取断然措施，予以赈济。他说：巡抚以抚绥地方、爱养百姓为职。今山西并未奏请赈济缓征，反行催科，小民何以存济？这都是因为巡抚德音去年曾奏报得雨，现在想掩饰以前所奏。当即命田文镜会同巡抚德音，率领地方官员速行赈济。

但德音还在为自己辩解，振振有词地说：定例收成五分不为灾。况且夏灾六月奏报，秋灾九月奏报。目下还不到报灾的时候，臣岂敢说谎？！

而田文镜雷厉风行，次日一早就上了路。到了省城太原，巡抚德音却以主持考试为由，拒不见田文镜。因此山西赈灾事实上由田文镜主持。他立即行文给平定州等四州县，让他们赶造花名册，登记赈灾人户。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工作，四个州县共有大小男妇13万人得到赈济，发放赈济粮一万石有余，赈济银一万多两。

田文镜的担当有为和精细高效，

得到了雍正的极大肯定。雍正随即把德音解职，山西巡抚由内阁学士诺敏补授；布政使森图革退。

通过山西赈灾，雍正开始考虑对田文镜这位敢讲真话、能做实事的从四品官员，委以重任。雍正最初的考虑是在朝中提拔。但山西的灾情远远超出最初的估计，也不是最初的四个州县，而是蔓延到全省大部分地区。这样，诺敏在四个州县没有赈灾完成前，就向雍正奏请，把田文镜留在山西，继续赈灾。雍正却有另一层考虑，即由田文镜接任山西布政使。他在诺敏的密奏上朱批：田文镜到后，朕将擢用于京城显要之缺。田文镜人若何？心地品行若何？当雍正接到诺敏有关田文镜“人勤勉，办事亦可”的肯定后，立即命田文镜署理山西布政使，并对诺敏说：田文镜将本年山西之事奏后，朕方知拯救了五六十万生灵，想必山西百姓必很感激他。

至此，田文镜到山西赈灾4个月后，由从四品的侍读学士一跃而成为二品的省级大员。赈灾完成后，田文镜正式出任河南布政使。9个月后，出任河南巡抚，成为开府一方的封疆大吏。对于田文镜的急速升迁，《清史稿》解读说：雍正嘉其直言无隐，令往山西赈平定等诸州县，即命署山西布政使。文镜故有吏才，清厘积牍，剔除宿弊，吏治为一新。自是遂受世宗眷遇。

（二）

田文镜仕途发迹，是因为直言山

西匿灾不报。可悲的是，田文镜晚年逐渐昏聩，丧失了官德与操守，没有善始善终，他失信于雍正与河南百姓的，竟然也是匿灾不报。而且，田文镜匿灾时间很长，涉及范围很广，成为他一生为官难以洗脱的污点。

田文镜担任河南巡抚后，雍正就不时给他敲警钟，提醒他：“善始者实繁，克终者盖寡。当日圣祖时曾有谕：‘督抚初用，各各多有好的，日久年多就变了。’此圣祖经历之确论。人能不改变、不忘初志就好了。朕亦以此自勉。”

雍正八年，河南灾情严重，雍正从其他渠道获知灾情，并已下令免征受灾州县的钱粮。但田文镜不但拒绝赈灾，而且严征钱粮，到九月已经征齐，致使百姓背井离乡，出省乞讨。湖广总督迈柱奏报山东、河南灾民流入湖广，有携家带口至武昌、汉口的，有流入麻城、黄安等地的，现已派员赈济。随后，署两江总督史贻直密奏：山东灾民逃荒南来，拟动用存公银两予以赈济，并资助灾民回到原籍。雍正帝为此质问田文镜：山东灾民流亡他省，尚属意料之中。麻城等地也有河南省饥民就食，此系何故，朕殊不解。河南从前未闻荒歉如此之甚，为什么抛弃乡井、纷纷到邻省乞讨？他还厌其烦地说：丰收歉收，都是常有的事，岂能保证年年风调雨顺？“若令属员隐饰捏成，不但不能免物论，亦无趣无耻事也。”田文镜回奏说他“汗流浹背，悚惶惶惧”。但还是报雨雪充足，丰收大有。

档案显示，田文镜以河南山东总督身份，于雍正九年四五月密奏，河

南“二麦丰登，家给人足”，十月又报丰收后，瑞雪纷飞，二麦皆已下种，长势茂盛。又报山东丰收，雨雪充足。密奏还有“此皆圣天子挽回造化，天人感应，捷于影响”。

但田文镜匿灾不报，致使河南、山东百姓流离失所的做法，已激起公愤，参奏他的密折一个接一个。雍正最初考虑田文镜毕竟是有功之臣，说他多年来把河南治理得非常好，岂能因为一件疏忽，就否定他一直以来的善绩。仍给田文镜以自我纠正的机会。

到了雍正九年二月，灾情蔓延，越来越严重，许多州县出现抢劫富户、社会失序的情况；卖儿卖女者，更是比比皆是。田文镜下令严禁买卖。雍正得知后，非常愤怒，认为在灾荒之年，匿灾不报的行为无异于把人往死亡里推。雍正严厉斥责说，今闻祥符、封丘等州县，乏食穷民，沿途求乞，而村镇中更有卖鬻男女，为山陕客商买去者。田文镜欲将说合之中保媒人，拘拿惩治。至于乡村有粮之家，多被附近穷民，昏夜之中，逼勒借贷，地方官竟然不能究问。朕听闻之后，深为骇异。田文镜近年来老多病，精神不济，故为属员所欺诳耳。荒歉之岁，以抚绥安插，使民不至离散为第一义，若不能抚绥安插，而但禁其卖鬻子女，以避离散之名，是绝其生路也，岂为民父母者所忍言乎？

山东的灾情也不比河南好。有人奏报说，山东去年水灾，收成仅三四分，而地方官竟然以收成七八分捏报无灾；又迎合上司之意，将饥民户口

官渡之战，袁绍败在何处

□ 吉炳伟

攻打曹操。官渡之战是袁绍发起的，袁绍在击败了孔融、公孙瓒等诸侯之后，逐渐拥有冀、青、幽、并四州的领土，成为雄居北方实力最强的诸侯。这时候他头脑发热，自恃地广人众，兵多粮足，想在官渡一举歼灭曹操。沮授劝说袁绍，认为大军连年征战，百姓疲惫，赋役繁重，仓库缺少储备，士兵苦于征战，应该休养生息，待时机成熟后，再行出兵。袁绍不听，认为沮授的良策是“慢我军心”，沮授也因这一次献计而获罪，失去了人身自由，被囚禁于军中。

其次是不听田丰的建议，错失良机。建安五年（200年），曹操离开官渡大营，攻打刘备。田丰对袁绍说，曹操到东边攻打刘备，一时半会儿结束不了，如能趁机举兵袭击他的后方，一定可以取得胜利。但袁绍却说孩子有病，不愿出兵。田丰气冲冲地退了出来，边走边用拐杖狠狠敲着地面，说：“嗟乎，事去矣！夫遭难遇之几，而以婴儿病失其会，惜哉！”完了，没有希望了！千载难逢的时机就这样失去了，可惜啊！后来曹操将刘备打败，田丰认为战机已失，再次进谏说，曹操既然打败了刘备，许都就不再是空虚的了，曹操善于用兵，变化无常，兵众虽少，也不能等闲视之，所以不如作持久之计，利用地理上的优势和众多的士兵，外接英雄，内修农战，挑选精兵，不断袭击敌人，使曹方不得安宁。袁绍弃良谋而不用，认为田丰败坏军心，将田丰关了起来，这一举动使全军将士寒心。

再次是不听许攸的计谋，导致许攸叛变。许攸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很有谋略。袁绍与曹操在官渡相持百余日时，许攸提出乘曹操倾军而出，许都防御空虚之际，轻骑奔袭许都。然而，袁绍因之前韩荀和刘备袭击许都失败，不想再分兵冒险，没有采纳许攸的建议。事有凑巧，许攸家族中有人犯法，被留

守邺城的袁绍亲信审配抓进监狱，许攸大为不满，一怒之下投奔曹操，给曹操带去了袁军的重要军事机密情报。正是在许攸的谋划下，曹操亲自领兵赴鸟巢，袭击淳于琼，鸟巢可是袁绍的粮仓啊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没有了粮食给养作保障，这个仗就没法打了。

最为致命的是不听张邈的意见，丢失鸟巢。当曹操奔袭鸟巢之时，袁绍部将张邈主张到鸟巢救淳于琼，他对袁绍说，曹操亲自出马，必然得手，那么事情就无可挽回了。袁绍关键时候犯了糊涂，不但不听劝告，还派高览、张郃率领重兵攻击曹操大营，只派少量轻骑部队救援鸟巢。高览、张郃攻营不下，鸟巢大败的消息已经传来了，二将无心恋战，竟然投降了曹操，袁绍全军大乱，一下子全垮了。鸟巢的丢失，使官渡之战出现了重大的转机，一举奠定了曹操转败为胜的大局。

本来袁绍手里握有一把好牌，论兵力，当时袁绍有11万人，而曹操不足2万人；论粮食，袁绍拥有强大的储备，而曹操一个月的储备都没有；论谋士，袁绍身边的沮授、许攸、田丰都是老谋深算的人物；论将领，袁绍手下的颜良、文丑、张郃、高览都是身经百战的猛将。就这么一张好牌，袁绍却不会打，不善于打，生生把它打成了稀里哗啦的烂牌。想想袁绍也是，一个人的忠言不听，二个人的忠言不听，三个、四个人的忠言统统不听，可见袁绍当时膨胀到了什么样的地步，由此也可以看出袁绍的失败是注定的。



□ 任国征

《夜雨寄北》，寄与谁人？

最近李商隐被热议。起因是某博主发文问：“李商隐是谁？抄袭了霹雳的《夜雨寄北》。”经人指正后又说：“对不起，不知道李商隐是个冷门诗人。”这一下子激起了众多网友的讨论，把“冷门诗人李商隐”送上了热搜。唐朝诗人李商隐七言绝句《夜雨寄北》：“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。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”此诗到底是寄给谁的？最为引人关注和扑朔迷离，多年来众人各执一词，议论纷纷。

在南宋时期洪迈编著的《万首唐人绝句》里，这首诗的题目为《夜雨寄内》，意思是诗是寄给妻子的。他们认为，李商隐于大中五年（851年）七月赴东川节度使柳仲郢梓州幕府，而王氏是在这一年的夏秋之交病故，李商隐过了几个月才得知妻子的死讯。清朝时期孙洙编选的《唐诗三百首》对此诗注释中说“题一作《夜雨寄内》”。

《夜雨寄北》，“北”就是北方的人，可以指妻子，也可以指朋友。这首诗选自《玉溪生诗》卷三，书中说“李商隐留滞巴蜀（今四川省）时寄怀长安亲友之作”。俞樾之孙、俞平伯之父俞陛云（1868—1950年）的《诗境浅说》中30首李商隐诗作的评注。其对于此诗说：“诗本寄友，如闻娓娓清谈，深情弥见。”可见是写给友人的。

总之，就诗的内容看，按寄给妻子角度，此诗情思浓郁，缠绵悱恻；若按寄给朋友角度，此诗依然细腻洒脱，情景交融。那么，以上两种观点哪个更合理一些呢？首先查阅历代古

人对于此诗的评注。《唐诗别裁》说：此寄闺中之诗，即认为是寄给妻子的。而《万首唐人绝句》题作《夜雨寄内》。《玉溪生诗集笺注》说：语浅情深，是寄内也。然集中寄内诗皆不明标题，仍当作“寄北”。认为有可能是寄给妻子的，但也理由不太充分。

查阅《新唐书》卷203和《旧唐书》卷190下，却发现李商隐居留巴蜀期间，正是在他39岁至43岁做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幕僚时。而在此之前，其妻王氏已亡。所以，寄给妻子不太符合实情。但是，在《李义山诗集笺注》中评《夜雨寄北》说：“‘料得闺中夜深坐，多应说着远行人’（白居易《邯郸冬至夜思》），是魂飞到家里去。此诗则又预飞到归家后也，奇绝！”可见，更多注家均不认为李商隐是寄给友人的。

可见，寄给妻子和友人两种说法都有明显的论据不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有必要再探寻其他理解的可能性。根据注解古诗的三种方法：参考古人注解、作者情况和本人作品互证，现在用第三种方法即以作者的其他作品来求证这首诗。逐一查阅李商隐《樊南甲集》和《樊南乙集》，发现三首思念咏怀诗很值得推敲斟酌，这为我们考察提供一些新的线索。

一是在南陵（今安徽省繁昌县）怀念长安友人的五言律诗《凉思》：“客去波平槛，蝉休露满枝。永怀当此节，倚立自移时。北斗兼春远，南陵寓使迟。天涯占梦数，疑误有新知。”从这首写给友人的诗来看，格调高雅浪漫，含蓄深沉。而《夜雨寄

北》则写得比较缠绵，不像是李商隐写给友人的。两首诗都有“北”字，《凉思》中的“北斗”，古人常用来比喻君主，这里指长安。可见，“北”可指某地点。二是在剑阁之南（今四川省中部）旅途中怀念亡妻的五言绝句《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》：“剑外从军远，无家与寄衣。散关三尺雪，回梦旧鸳机。”纪晓岚曾对此批注“回梦旧鸳机，犹作有家想也”。可见，妻亡之后家也依然令人思念。然而后人解读《夜雨寄北》时认为妻子去世不可能寄给妻子，但却忽视了可以寄给妻亡后的“家”，因而更加思念长安的家。

三是在长安怀念故乡河南荥阳的五言绝句《滞雨》：“滞雨长安夜，残灯独客愁。故乡云水地，归梦不宜秋。”上两首诗是从外地思念长安，而这首诗则是在长安思念故乡河南。此诗的写景与《夜雨寄北》极其相似，如“雨夜”和“灯烛”。这首诗是思念故乡，那么《夜雨寄北》仍可能是思念故乡的。《滞雨》后两句是名句，是说故乡多雨，即使返乡也不要在多雨的秋天，来表达思乡不至的故园情怀。

所以，根据李商隐其他类似诗作的表达特点。可以初步推测《夜雨寄北》不是寄给妻友人的，而是作者漂泊中寄托对“第一故乡”和“第二故乡”的思乡之情。因为“巴山”之北确实是长安和荥阳；“寄”字之后跟地名（故乡）也最为常见和合理；而以“北”代指故乡，则显得新颖别致，语出惊人，也符合李商隐的作诗风格。

